

## 專題研究

## 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的生存與發展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 in India

蘇嘉宏 ( Su Chia-Hung )

輔英科技大學人文與社會學院副教授

## 摘 要

長期以來，中原政情變遷影響西藏局勢。流亡伊始的達賴喇嘛對於他所領導的政治活動，就已經有著清楚的「為自由而鬥爭」的自我定位，他不是為了「恢復舊制度」，而是為了「西藏民族、國家和宗教權利與自由」而奮鬥，立意改革。達賴喇嘛總結了過去幾十年的成果，他認為流亡藏人最大的成果是建立了「流亡政府」、「定居點」、「學校」以及「寺院」。「政教結合」的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建立，有其延續歷史、文化的期許，西藏流亡政府對實行「政教結合」民主制度，做到一方面傳承文化與發展民主，另一方面也接受現實與準備妥協。西藏流亡政府的制度發展中的突出議題是達賴喇嘛的轉世傳承問題，這個問題必須放在與北京當局和談中觀察。

關鍵詞：達賴喇嘛、西藏流亡政府、政教結合、轉世制度

## 壹、中原政情變遷影響西藏局勢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建立政權之後，解放軍開始入藏；中國共產黨在「民主改革」、「社會改革」等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口號、行動的驅使下，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所帶來巨大負面影響，這和歷史上中原政情變動牽連西藏情勢一般，但這次嚴重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暴虐，卻為西藏的民族主義打下了深厚穩固的基石」

的程度<sup>1</sup>。

目前，流亡在印度的西藏人約有 13 萬人以上，他們大多在 1959 年達賴喇嘛從西藏出走後，陸續跟隨而至，做為西藏流亡政府的「統治對象」之「人民（流亡藏人）」，在過去幾十年中人數不斷成長，向心凝聚，從而使得達賴喇嘛所領導、所建立的西藏流亡政府因之而更加鞏固。13 萬流亡在印度的藏人和中國大陸的近 460 萬藏人數目懸殊，但是兩地兩種不同的政治地位、政治制度，其間關於舊時期種種流弊改革的訴求，雙方文件與政策中經常可見，彼此間存在著一種競爭關係<sup>2</sup>。

每一個流亡藏人身上都會有一個血淚交織的故事，穿過雪域後流亡藏人被視為「難民」，到達境外的第一個「轉運站」，通常最重要的是設於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的「聯合國難民總署（UNHCR）」。根據該署的統計，每年平均有 2,500 位藏人冒著性命危險，出亡境外。但是，由於晚近中國大陸和尼泊爾的關係改善，尼泊爾的邊界管理日趨嚴格，自 1991 年起，凡沒有簽證的外國人禁止進入或停留尼泊爾境內，以往雙方實質上幾乎不存在的國境線，已經被中尼雙方勾勒得越來越加清晰了。但是，聯合國難民總署跟尼泊爾簽訂一項「君子協定」，容許來自西藏的難民在此「轉運」，這項工作主要由美國政府出資辦的「西藏難民轉運中心」負責。其中流程通常是先輾轉再從尼泊爾出境，繼續投奔到印度的達蘭莎拉，在那裡的難民接待中心停留一段時間，接受了達賴喇嘛的親自祝福之後，才被分派到各個寺院、學校和定居點去。但是，最近尼泊爾因為王室內亂、毛派游擊隊猖獗等因素而政情混亂，尼泊爾已經開始直接遣返偷渡入境的流亡藏人。

相對於此，晚近的幾年之中，也開始有為數不少的流亡藏人陸續回流到藏地，這又反過來對西藏當地的統治當局心理上、安全上形成某種威脅。雖然，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至今雖已超過 20 年，儘管仍有許多藏人指控認為中國大陸「迫害西藏

<sup>1</sup> 董尼德（法）著，蘇瑛憲譯，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 年 4 月 1 日，第 1 版），頁 141。類似董尼德所指出「文化大革命」與「西藏民族主義」之間的因果關係的學者、相關著作甚多，大都一致地持贊成態度；但是，中國大陸學界的觀點則也相當一致地認為文革的受害者是不分漢藏的，這不應該是民族問題。例如：「文革十年浩劫是中國所有民族的災難，包括少數民族及漢族。」「這個動亂（指文革十年浩劫）不是因為種族的衝突，而是因為林彪和江青所領導的兩股反革命分子勢力，『向所有華夏各族的人民發動總攻擊的結果。』」，*Questions and answers about China's national minorities*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983), p.37。

<sup>2</sup> 根據中國大陸的資料，中國大陸的藏族目前人口為 4,593,330 人，仍普遍信奉喇嘛教（藏傳佛教）；主要聚居於西藏自治區，以及青海省的海北、黃南、海南、果洛、玉樹幾個自治州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甘肅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縣，四川省的阿壩、甘孜兩個自治州和木裏藏族自治縣，雲南省的迪慶藏族自治州。藏族有自己的藏語與文字（藏文是西元七世紀時，參照梵文字體創制的自左向右橫寫的拼音文字），此外還有衛藏、康區、安多三種主要方言。三區組成的藏人族群，依然在印度的藏人社區繼續成為重要的結構因素。

人權」，並且「將漢人大舉遷入西藏，企圖消滅西藏文化」；雖然，西藏也確實在這「改革開放」、「輸血式經濟投注」的大環境中相當程度地受益，但從「改革開放」以來，北京當局的「治藏政策」卻反而日趨強硬。北京治藏始終置重於成效正面或負面難以評估的「經濟發展」，可是「西藏問題國際化」，或說是以西藏流亡政府所代表的歷史遺留問題，仍然沒有因此而獲得解決<sup>3</sup>。

## 貳、「政教結合」的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建立之意義

流亡伊始的達賴喇嘛對於他所領導的政治活動，就已經有著清楚的「為自由而鬥爭」的自我定位，他不是為了「恢復舊制度」，而是為了「西藏民族、國家和宗教權利與自由」而奮鬥，立意改革。他曾說：

「世界上喜歡中共的人有多少大家都一清二楚，如果能把我們的願望和利害好壞都毫無隱瞞地清楚表現出來，才能贏得世界上公正的廣大人民的支持，特別是我們有那些落後的舊傳統要心中有數。從西藏的國家獨立和民族自由的長遠利益考慮做出長遠的規劃，則可以證明我們反對中共不是為了恢復舊制度，而是為了西藏民族、國家和宗教權利與自由而進行鬥爭的事實得到證實。」<sup>4</sup>

達賴喇嘛在流亡初期（1960年以前）對於當時西藏流亡政府的公務員（主要還是舊西藏時期的貴族）的工作方式顯然極為傷心，從那以後達賴喇嘛開始逐漸起用民間有才識的人，舊西藏時期的那些貴族則逐步先後遭到汰換。達賴喇嘛至今在這個讓西藏流亡政府不斷自我完善的道路上，除了在發展方向上堅持民主、自由、人權理想之外，自己也實實在在地扮演起「主導者」的角色，歷數十年而不改其志。

達賴喇嘛在2002年9月23日在西藏人民議會第四次會議上的講話中，達賴喇嘛總結了過去幾十年的成果，他認為流亡藏人最大的成果是建立了「流亡政府」、「定

<sup>3</sup> 中國大陸常見的宣傳認為，「1959年全面進行了民主改革，廣大藏族人民才真正獲得了新生。」在藏族人民的努力下，藏族地區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上，「逐步擺脫了過去貧窮落後的面貌，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興旺景象。」但是，現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內閣部長桑東仁波切顯然不這麼認為，最近他在印度達蘭薩拉接受美國之音記者專訪的時候，稱目前的西藏局勢是「文化大革命以後最差的時期之一」。桑東仁波切說：「目前的西藏形勢非常糟糕，因為最初，壓制行動只集中在政治、宗教和社會方面，現在已經擴展到經濟領域了。開發西部—特別是西藏—的經濟計畫，給漢人移居西藏創造了大量機會，使藏人在社會、文化和經濟方面處於邊緣地位。」顯然，對於「輸血式經濟投注」的評價，藏人的看法未必是正面的。資料來源：<http://observechina.net/info/da.asp?ID=17475&ad=7/4/2002>。

<sup>4</sup> 達賴喇嘛1960年9月9日講話。這是達賴喇嘛在有代總理樂康瓦、噶倫索康、代理噶倫辛喀瓦、柳夏、玉妥，以及公務員代表扎薩克蔑巴、堪仲阿旺敦珠、孜仲阿旺曲松、孜仲香巴旺德譯三區議員11人的會議上講話。

居點」、「學校」以及「寺院」。西藏流亡政府認為，建立上述這些單位的結果是使得「西藏的自由鬥爭事業得到延續」；而且「政教結合」的西藏流亡政府之建立，可以使這種鬥爭一代接一代延續不斷地進行下去，同時定居點、學校和寺院是讓西藏難民不至於四處流散，藉此在印度這個多元民族、宗教複雜、人口眾多的國家中保持了西藏的民族特性和文化。寺院的建立對延續西藏文化和宗教而言，更是重要。在印度的藏傳佛教寺院為 80 年代以後，大量從西藏前來的僧侶提供學習場所，使在西藏曾經中斷幾十年的法脈很快地重新聯結上去，獲得延續。因此，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清楚地認知，其本身並非藏人政治事業的目的，只是一個爭取民主、自由、宗教和文化存續的方法。

對於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教結合」制度，達賴喇嘛受訪時表示，佛教就有民主的因素，他說：

「從佛教的觀點而言，大約也是有民主因素存在的，在兩千五百年以前，佛陀就提出在眾比丘中，有些事情必須要由五名以上的比丘做出決定，不能由一人決定。又如西藏引進比丘尼制度問題，中國有比丘尼傳承，因此很多人提倡引進，我個人完全贊同，但是這需要由持戒比丘討論決定，不是由達賴喇嘛說了算！因此，這一切雖然尚不能稱之為民主，但其實已經具有民主的形式，將此應用到政治上也就水到渠成。」<sup>5</sup>達賴喇嘛回憶，在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當時一些政府官員就提出應該在政府官員中推舉攝政，而不是選喇嘛擔任攝政，因為喇嘛雖然精通佛法，但沒有政治經驗。因此，在新的達賴喇嘛產生之前，應該選一位資深政府官員擔任攝政，這雖然不是全民直接選舉等一類的民主化方式，但其中已經表現了民主的思想或意識。臺灣的民主化過程相對平順，但仍艱苦，而且是人民跟政府爭取；但是，在西藏流亡社會，卻是由達賴喇嘛主動領導民主運動，而人民反而遠遠跟不上達賴喇嘛的民主化進程，最令世人矚目！

達賴喇嘛不能同意將「政教結合」簡化為「喇嘛掌權」。達賴喇嘛說：

「喇嘛掌權可能有有利的一面，但也出現了許多的麻煩！對『政教結合』有兩種解釋可能有有利的一面，但也出現了許多的麻煩！對『政教結合』有兩種解釋，一種是宗教領袖或其喇嘛<sup>6</sup>，擔任政治領導人，如八思巴；

<sup>5</sup> 蘇嘉宏訪問達賴喇嘛紀錄（全文），2003 年 4 月 17 日下午 1 時至 2 時 10 分，達賴喇嘛在印度達蘭沙拉行轅接見、受訪；其中「部分內容」曾經摘要刊登於聯合報（臺北），民國 92 年 5 月 21 日，第 A10 版。

<sup>6</sup> 指以轉世喇嘛為中心形成的一種體系，可大而成為一國之管理機構，可小而僅僅是轉世喇嘛的私人秘書處和勤雜人員系統。

另一種是有宗教信仰的人、由相信因果報應的人去掌握政治權力，如國王赤松德贊和松贊干布，他們是佛教徒，承認因果報應，行事公正，像赤松德贊，在寂護和蓮花生座前聽法受戒等，他雖然不是喇嘛，但卻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同時也是西藏的國王，像是這一類的，我認為也是一種『政教結合』。八思巴式的『政教結合』，一方面是喇章組織，同時又是西藏的政治領袖，八思巴圓寂後，仍由薩迦喇章的人掌握權力，薩迦王朝以後的帕竹也是一樣，再後來就是五世達賴喇嘛的『政教結合』，就這類『政教結合』而言，由喇章掌握權力是錯誤的。因此，現在十四世達賴喇嘛就要改變這一點！但是，如果一個掌握政治權力的人是一個真正虔誠信仰宗教的人，則他在處理政治事務時就會遵循善惡因果而公正無私，不說假話，這種『政教結合』是好的。」<sup>7</sup>

達賴喇嘛認為，政教關係應該適當地分離，從制度層次而言，如達賴喇嘛的轉世傳承即使存在，他的喇章也不能就等同於是西藏政府當局，在任何地方，政府與宗教組織的型態要有所區別。未來西藏政府的元首是否一定要由僧人來擔任？達賴喇嘛認為：

「這要看選舉的結果，國家元首應該是通過選舉產生，如果人民支持和投票選舉薩迦法王擔任國家元首，那也是他個人的行為，跟喇章無關，如果達賴喇嘛的傳承還繼續存在，如十五世達賴喇嘛等，如果是一個有能力的人，也可以當選，但那時候的當選應該是通過政黨政治產生，現在我領導的西藏自由運動不屬於任何的政黨，未來，西藏真正實現民主後，則需要政黨，而我認為喇嘛加入政黨組織是不妥當的，我在拉達克和門達旺就常說，不要說轉世喇嘛，就是一般的僧人最好也不要參加政黨派別或去投票，僧人如參與政治，一個寺院就會有不同黨派的僧人，並產生不必要的糾紛，即使一個家庭，也會因為政黨歧見而在選舉期間相互攻擊，選舉結束後還不能釋懷，乃至互相不說話等等，這算什麼？又何必呢！當然，這是由於沒有形成一個成熟的民主政治生活習慣；因此，未來的西藏政治民主化以後，可能會遵循政黨政治的道路，需要不同的黨派，喇嘛僧人加入黨派可能會有不少麻煩！現在的（內閣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他不屬於任何的黨派，是以個人身分當選的。」<sup>8</sup>

達賴喇嘛說：

<sup>7</sup> 蘇嘉宏訪問達賴喇嘛紀錄（全文）。

<sup>8</sup> 同註7。

「在 40 餘年的民主化過程中，其最高的成就是兩千年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了首席部長，也就是最高政治領袖，這是我們民主發展過程中的最高階段，對此我感到滿意和放心。現在，總的來說最重要的是教育和文化的發展，目前流亡政府 40 多歲以下的人中有很高的比例獲得了受教育的機會（助手補充說明：99% 以上），大概有這樣高。」<sup>9</sup>

## 參、西藏流亡政府對實行「政教結合」 民主制度的未來期待

### 一、傳承文化與發展民主

西藏流亡政府內閣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受訪時表示，達賴喇嘛返回西藏，要將現在在達蘭莎拉西藏流亡政府所實行的民主制度帶回去實行<sup>10</sup>。西藏流亡政府依法而治，完全根據流亡憲章所規定的框架而運作。對於「政教結合」的解釋有很多種，有人說「政教結合」就是「喇嘛可以當官」，「喇嘛當官」並沒有法律禁止，但「喇嘛當官」相對地也沒有任何特權，臺灣和西方民主國家也都如此。以桑東仁波切為例，他是現任西藏流亡政府的首席內閣部長，也就是噶廈主席，雖然西藏流亡政府刻意不稱總理，但其職權相當於總理，他是流亡藏人以「一人一票」的直接選舉方式產生的第一位首席內閣部長。

現在流亡憲章將內閣首席部長的產生方式改變為直接選舉，雖其法定職權並沒有任何改變，但在操作上則更具有民意基礎作為後盾。桑東仁波切指出：「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教結合』與中世紀西方的『神權政治』完全不同，是根據社會現實而制定法律，在法律上信仰與不信仰者，一律平等；所以，『政教結合』是『民主和佛法可以並行不悖，很好地結合。』對『政教結合』的批評很多，任何國家的總統、總理大都有自己宗教信仰，但不會因為他們的宗教信仰而不能從政。」<sup>11</sup>

1990 年制定流亡藏人憲章時，當時的西藏人民議會以相對多數的些微差距取消原始規定的「政教分離」，反而恢復了「政教結合」，但除了這個條文以外，事實上以下與此有關的具體運作內容都沒有相應配套地改變，仍是「政教分離」的。對此，桑東仁波切說：「我們不否認西藏流亡政府是『政教結合』的，但『世俗政府（secular

<sup>9</sup> 同註 7。

<sup>10</sup> 桑東仁波切訪談紀錄（全文），2003 年 4 月 17 日下午 6 時至 7 時 30 分，桑東仁波切在達蘭莎拉噶廈內閣首席部長會客廳接見、受訪。

<sup>11</sup> 同註 10。

government)』的實際運作則是『政教分離』的。1990年我們制定流亡藏人憲章時，西藏人民議會以『24：22』取消原規定的『政教分離』，而恢復了『政教結合』，但事實上以下的具體運作內容都沒有相應的改變，仍是『政教分離』。至於出家僧人可以同時在『宗教代表』、『區域代表』兩種類別的選舉中各投一票，有違『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則，體制上這是議會應行『修法』的問題，這類似問題在印度的上議院也有碩士學歷以上選民，可以另再投票選出代表的規定。」<sup>12</sup>

## 二、接受現實與準備妥協

西藏流亡政府長期受到印度當局的寬容、保護，卻又始終不能得到印度政府的承認，地緣政治因素對於西藏流亡政府的存在、發展一直都是宰制性的力量。北京當局在西藏部署有廿多枚攜有核子彈頭的中程導彈，還有數量不詳的短程導彈，射程涵蓋印度大部分地區與南亞<sup>13</sup>。如果事實如此，即使西藏流亡政府與中國大陸之間關係全面改善，北京當局將來必定也不會放棄在西藏駐軍這個戰略需求與利益。未來，迫於現實，西藏流亡政府還是會採取妥協的立場，「容許解放軍繼續駐防」。因此，西藏流亡政府在這個攸關南亞次大陸戰略軍事均衡的問題上，也必須考量過自己可能扮演的角色。

未來，北京當局繼續在西藏「駐軍」，以及主導西藏的「外交」，循著「一國兩制」的思路，幾乎是毫無疑問的；達賴喇嘛在「史特拉斯堡建議」、「五點和平建議」中已經明確談過，未來可能還包括西藏的經濟問題。因為西藏的經濟基礎極為脆弱，現在西藏的經濟發展就彷彿是用汽車拉水在沙漠中營造出一片綠地，並不是西藏本身經濟發展的結果，而是北京當局花大錢，長期輸血營造出來的。因此，就維持這種對漢藏雙方而言都是必要的繁榮而言，仍舊需要北京當局的繼續參與。

「駐軍」和「外交」關係著一個國家的主權象徵，藏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首先會理性地優先考慮到民族的生存及人民的權利，西藏流亡政府既然已經放棄了「主權獨立」的希望，當然就沒有理由拒絕北京當局在西藏駐軍與主導外交。因此，西藏流亡政府認為，西藏「高度自治」的首要問題，主要是「西藏的統一」、「藏語文的使用」、「人權保障與民主」等，如果實現並保障了這些議題，其他的都不是現階段迫切的問題。

雖然如此，西藏流亡政府和達賴喇嘛也明確反對北京當局在西藏「傾倒核廢料」和「部署核武器」。這不僅是有鑑於西藏是中原眾河之源，在西藏傾倒核廢料受害的不僅僅是西藏，還將會使河流中下游的中國大陸精華地區也跟著受害。因此，西

<sup>12</sup> 同註 10。

<sup>13</sup> 法國電臺，2003年1月26日。播報中說，印度將領幸哈如此表示。

藏流亡政府一方面設有專責單位長期持續關注雪域的環境保護，經常批判北京當局在西藏高原的制定、執行環保政策的缺失，但也相信北京當局應當不會在此失去決策應有的理性，危害到「漢藏環境生命共同體」。但是，就北京當局在西藏部署核武器而言，長期以來確實已經有很多的類似報導，西藏流亡政府的態度是可以想像的。在南亞次大陸，印度和巴基斯坦雙方面已經有效發展「核威懾」力量，尤其是可以長距離運送核彈頭的長程飛彈，雙方並一再地在大氣層試爆核彈，喜馬拉雅山南北兩麓的國家或地區儼如一個緩衝區，隔離中國大陸和印巴雙方，西藏流亡政府現在和未來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於這一個國際戰略格局。

## 肆、西藏流亡政府的制度發展

1959年流亡藏人剛到印度時，所熟悉的只有藍天和大地，當時的藏人只能將全部的希望寄託在達賴喇嘛一人身上。但是，達賴喇嘛也只比他的臣民稍微強一點，因為畢竟他還曾經去過中國和印度，但達賴喇嘛除此之外也沒有其他任何的優勢，他能夠依恃的依然是人民對他的無限忠誠和信仰。在當時印度政府和國際有限的支援下，達賴喇嘛和他所領導的西藏流亡政府逐步取得建立學校、定居點、寺院以及西藏政府民主改革等成就，這一切也反過來成為西藏流亡政府存在和延續發展所需要的最堅實基礎。另外，由於西藏藏傳佛教各教派的大部分領袖也同時都逃出了西藏，這些宗教與文化的相對優勢對於流亡藏人在其未來的流亡歲月中，既得以維持自己的文化，又能免於文革浩劫的磨難，在向國際社會介紹西藏現狀和文化時發揮了極為重要的正面作用<sup>14</sup>。

可是，除了藏人埋首於上述定居點、建校以及從事內部改革之外，當時的國際環境也不利於西藏的。當時，藏地已經處於北京當局的絕對控制下，流亡藏人對西藏內部的變化和決策等，完全無能為力，不能施加任何影響。當時處於冷戰時代二元對立的國際格局之中，藏族特殊的訴求還是被淹沒在冷戰的思維中。中國大陸不僅一度有冷戰雙方一極的支持，而且由於冷戰中，美蘇雙方都試圖「打中國牌」來牽制對方，這也使得中國大陸漁翁得利。

此外，由於北京當局事實上管領西藏，西藏又顯得那樣落後和微不足道，加上世界上的很多小國和弱國都將中國大陸從原來的弱國變成強國視為自己國家發展的典範或擺脫困境的一種光明途徑，因此，世界各地都有許多毛澤東主義的信奉者，

<sup>14</sup> 本段以及以下的介紹，主要根據對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聯合秘書長達瓦才仁的訪談、說明。



加上中國大陸的宣傳力量強大、意識形態吸引人，西方的左傾文人、媒體也不斷地著書立說附和，一方面渲染新中國的平等、強大和繁榮，另一方面則一提到由喇嘛以「政教結合」型式統治的西藏，就以歐洲中世紀的「政教合一」之黑暗時代來比擬，對中國共產黨描述舊西藏之黑暗、落後和野蠻，以及解放後的西藏農奴翻身當家做主等宣傳幾乎毫不懷疑，全盤接受。事實上，當時西方世界沒有人知道西藏發生的任何事情，極少數曾經入藏的像韓素英這樣的外國學者，除了熱情地歌頌，並沒有告訴世人任何西藏真實的信息。

西藏由於幾千年來遺世孤立，開始流亡之際，先不論一般只會說自己地方方言的農牧民，即使是高層政府官員或菁英分子，他們對這個世界的所知也極為有限。形象地說，流亡藏人的流亡，不僅僅是從藏地進入印度，而且也是一下子從 19 世紀跳躍進入 20 世紀。落差既大又無人願意傾聽他們的聲音，因此即使是一些同情西藏的國際友人，也認為流亡藏人的努力幾乎等同於「醫死牛」一般，是一種毫無希望的掙扎。

上述的情況一直維持到了 80 年代，從那時候開始，西藏問題才逐漸引起世人的關注。2003 年 6 月，印度總理瓦傑帕伊總理訪問中國大陸，雙方做出中印聯合宣言。其中提到印度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個自治區，印度方面重申不允許西藏人在印度從事反對中國的活動，還提到中印通過錫金進行邊貿往來。國際評論多認為作為對印度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的回報，中方則承認錫金是印度的一個邦<sup>15</sup>。

國際情勢轉變，西藏流亡政府也必須做出因應。目前國際社會支持西藏的團體或力量，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 一、政治上支持西藏的團體

這些團體是「西藏問題國際化」或西藏問題在國際上引起關注的主要力量。達賴喇嘛曾經說過：「我們西藏有三皈依，也是三個怙主，而國際支持西藏的組織是西藏的第四個怙主。」他們的重要性可見一斑！據介紹，這些組織成員都是自願組織和加入支持西藏組織的，他們通過資訊和親身體驗而了解西藏後，將幫助西藏作為自己的人生重要事業，主動出人、出錢、出力和出時間，西藏流亡政府堅決地說從未給過他們一分錢，而且西藏政府也說不清楚全世界究竟有多少個支持西藏的團體，他們估計認為大約有超過三百個之多<sup>16</sup>。可見西方支持西藏團體的廣泛性與草根

<sup>15</sup> 但中國大陸官方對錫金問題的表態，還是比較保留的，認為錫金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拖延時間較長，不可能在一夜之間、翻手之間得到解決，但還是希望這一問題逐步得到解決。

<sup>16</sup> 其中包括分布世界各地的學生組織，支持西藏的學生組織在很多學校都存在，西藏流亡政府說，僅僅在美國據說就有五百多個，但在此計算時只算一個。

性。還有，世界上雖然有反對南非種族隔離和反越戰等世界性的支持組織或活動，但能像支持西藏的組織如此持續不斷，而又廣泛地在全球推動者，實甚特別。由於支持西藏組織都是自願自發成立的，不僅成員多寡和擁有資源的程度參差不齊，而且開始也沒有一個「統一的協調組織」，因之造成重複支持和資源浪費，以及不能形成可觀的力量，不能不說是一種損失。為此，西藏流亡政府迄今已先後召開過三次「國際支援西藏組織代表大會」，並成立了一個「協調小組」，這個小組的成員由各組織代表通過投票選舉產生。由於第一屆主席是英國人之故，目前的「協調小組」在英國設置有專門機構運作。但是，由於各支持西藏團體是自發建立的，在一些側重點和立場等方面也始終各有不同，據了解，目前只有百餘個組織接受這個小組的協調，其他的百餘個組織仍未加入這個「協調小組」。在接受採訪時，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的官員表示，第四次國際支持西藏團體代表大會將在 2003 年 10 月底在捷克召開，會中會進一步討論協調和統一力量的問題。

## 二、宗教上同根同源的團體

許多西藏的年輕喇嘛來到印度後，藉著學習、進修，藉著流利的英文融入印度和西方社會，其中又有不少人轉往歐美國家，並在這些國家的社區中建立藏傳佛教社團。據粗略統計，在主要以西方國家為主的全世界六十多個國家中，至少有五百多個西藏宗教團體，這些宗教團體都屬於藏傳佛教四大教派或苯教信徒，這些信徒在接受藏傳佛教後自然地關注西藏，並有不少人抱著回饋西藏的動念支持西藏。

## 三、理念上關注人權的團體

他們基於人權理念，強烈批判、譴責北京當局在人權領域對藏人的侵害，這些主要是由於西藏社會把個人的權利和信仰自由等視為天賦人權，他們像虔誠的宗教信徒對待宗教一樣，將其視為極為神聖的理念，特別是西藏面臨宗教、文化、民族、語言、環境等多重壓力，因此很多人權組織前往西藏了解情況，蒐集材料，研究西藏問題，並不斷地向國際社會提出有關西藏各方面人權狀況的報告，督促世界各國政府向中國大陸政府施加壓力，促使中國大陸改善西藏人權，其中以「國際特赦組織（又譯稱『大赦國際』，Amnesty International, A.I.）」最為著名。為了協調、聯繫與這一類的組織，西藏流亡政府成立了「非政府組織性質」的「西藏人權與民族促進中心」，負責向國際社會提供有關西藏人權的信息。另外，西藏流亡政府還主導成立了「非聯合國成員國組織」，以促使這種人權壓力能夠更加有系統地集中力量。

## 四、學術上的藏學研究機構、團體或個人

藏學領域的行程與發展，有其長遠的歷史。國際社會對西藏的關注始自 19 世紀，但真正形成一種比較具有普遍性影響力的學術領域，則是在 20 世紀的 50 年代

以後，隨著大量西藏民族菁英分子流亡海外，他們獲得一些國家的學術研究團體之邀請，前去擔任西藏研究之教席、講座等，而一些西方學者本身也開始有系統地長期研究西藏。由此開始，逐漸有一些「藏學專家」超越歷史上主要靠「遊記」、「傳說」解釋西藏的範圍，盡可能地用一種客觀的立場研究、介紹西藏，使西方世界對了解真實的西藏發揮了重要的作用<sup>17</sup>。中國大陸當局顯然也看到了這個領域的重要性，從1980年代以後，先後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眼中具有明確政治傾向的藏學研究機構，大量培養藏學人才<sup>18</sup>。

### 五、西藏文化圈

西藏文化圈指的是藏語區或藏傳佛教為主的地區，包括西藏、喜馬拉雅山區的不丹、尼泊爾、錫金、拉達克等為主的各國或地區，以及蒙古人分布的區域，包括俄羅斯的卡爾梅克共和國、布里亞特共和國等，以往這些地區的喇嘛都要在其中選派有志者為學僧前往西藏留學，西藏與前述國家或地區的文化聯繫，至為緊密。到了冷戰時期，蒙古、西藏大多陷於鐵幕之中，自顧不暇，但喜馬拉雅山地區的藏人則拜藏傳佛教中心轉移境外之賜，至今仍有成千上萬來自前述國家或地區的學僧在流亡藏人開辦的各種宗教學校和寺院中接受教育，他們自然地心向流亡藏人社區，在政治上支持西藏，在南亞次大陸穩固地支持流亡藏人社會的基本力量。目前，有總部設在德里的「印藏友好協會」和「喜馬拉雅佛教聯合會」等作為中心或協調機構負責協調工作。

### 六、利益團體和特殊訴求的團體

一些利益團體和特殊訴求的團體，例如：工會、環保組織、支持弱勢群體或文化的組織等，也有相當一部分支持西藏的。如因西藏地處世界屋脊，亞洲的大部分河流均發源於西藏，西藏環保直接影響到週邊很多國家和幾十億人口的生計，因此國際性環保組織為了抗議中國大陸政府的開發對西藏環境的破壞，轉而支持西藏。還有如在美國的「印地安人組織」也很自然地支持西藏，將西藏視為與其有著相同命運的國家或民族。另外，一些反對和抵制中國大陸商品以免影響當地工人飯碗的工會，也會支持西藏，他們雖然不是支持西藏的主要力量，但在一些抗議集會或遊

<sup>17</sup> 其中約翰·F·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記》成為西方世界了解現代西藏的入門讀物，西藏流亡政府接觸過很多西方人士表示，他們是在看了這本書以後才轉而支持西藏的；此外，還有董尼德（法國）的《西藏的生與死》也是著名的系統地介紹西藏內部情形的專著。

<sup>18</sup> 根據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網站的介紹，目前中國已經擁有兩千餘名藏學人才，而且大部分都是漢人，出版的刊物有《西藏研究》、《中國藏學》等。2003年在英國牛津大學召開的第三次國際藏學研討會，四百餘名與會者中，中國大陸政府派出了六十多人的陣容，有二百餘人提交了論文，而流亡藏人派出的學者不過六、七人而已，由此可見國際社會對研究西藏的重視和研究陣容之結構。

說等的時候，多會積極參與。

#### 七、西方知名政界人士和藝人

一些西方知名政界人士和好萊塢明星等國際名人對西藏的支持甚力，他們對西藏的支持雖然無疑地有些趕時髦的嫌疑，但對於千百萬他們的支持者、觀眾或一般人而言，卻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力，從李察基爾倡導和組織的「西藏年」活動，以及一些歌星組織的西藏演唱會等等，動輒都可以吸引幾十萬人參與。

### 伍、達賴喇嘛的轉世傳承問題

從某一世的達賴喇嘛圓寂後，到另一世的達賴喇嘛轉世、成人到足以擔當執政重任，這中間可能出現 20 年左右的「領導真空」；對此，西藏流亡政府的運作將會根據流亡憲章，在這段期間由「三人執政委員會」來主導一切。晚近內閣首席部長選舉方式改革，由流亡藏人以直接選舉的方式選出桑東仁波切出任的目的之一，也就是為了避免將來出現「領導真空」等類似問題。世人極為矚目達賴喇嘛的身體健康與傳承問題，臺灣人民非常地尊敬達賴喇嘛的同時，其實也多了一分關懷。

針對外界傳言達賴喇嘛的身體健康情況不佳一事，達賴喇嘛說：

「去年（2002 年）1 月，我在菩提迦耶時患病，病得還蠻重的，去孟買治療了一週左右，得的是肺炎，是發炎腫脹，醫生說病情嚴重，甚至可能會危及性命。但現在已經完全康復，沒有問題，因此也不要（臺灣方面提供）醫療方面的幫助。」<sup>19</sup>

外界傳言達賴喇嘛得了癌症，是否真實？達賴喇嘛說：

「我沒有得癌症！之前，中國方面就曾在西藏說我得了癌症，大約兩千年時，我的一個熟人，是個格西，他回西藏並在當地資助建立一個學校，他到家鄉時，很多人都問他達賴喇嘛是不是已經圓寂了？他說沒有啊！我來時還好好的。當地人說聽說達賴喇嘛得了癌症。不僅如此，我的座車有一次在菩提迦耶有輕微碰撞，在北京就被說成是我因車禍斷了肋骨，而且還血便等（笑）。去年我真的患病，在拉薩的一些中國官員卻說我是在裝病，說我因病取消時輪金剛法會等都是偽裝，是為了騙取國際社會對西藏的同情（笑）。就是這樣，我得病時說我是在裝病，我沒有病卻硬說我的了癌症、斷了肋骨什麼的。現在我是很健康，最近幾個月，我連續到各地去講經，

<sup>19</sup> 同註 7。

在色拉寺、哲蚌寺、菩提迦耶以及達蘭莎拉等一場接一場地舉行法會，累計有很多時間（這時他與助手一起計算講經的時間），從去年（2002年）10月到今年（2003年）3月，我累計講經至少150多個小時，而且不感到一點的疲倦！所以，現在是很健康的！」<sup>20</sup>

西藏流亡政府目前最大的期望可能是達賴喇嘛在世期間能夠返回西藏，如不能的話，以後的事情就不能回答了！畢竟，達賴喇嘛解決不了的問題，別人更解決不了！桑東仁波切不認為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西藏」之現制能被北京接納，但是中國自己遲早也要走上民主的路，他深信事情會有轉機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化對不丹、尼泊爾也有影響，桑東仁波切說：「雖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因此而感到不安，但不丹已意識到難以長治久安，正在一點一點地仿效，而尼泊爾現在還很難說，不穩定！」<sup>21</sup>直選產生內閣首席部長以後，在西藏流亡政府的現行決策過程中，達賴喇嘛是否仍有最後的否決權？桑東仁波切說明：「日常政務均由內閣自行決定，必須上報者越來越少；上報達賴喇嘛與否也沒有明確的標準，目前實務上是『與北京和談有關的問題』、『與印度當局互動有關的問題』兩者，均需呈報。」<sup>22</sup>

參與西藏流亡政府的運作基本互動單位，並非一般民主國家常見「政黨」。流亡藏人社會雖然有許多的民間團體，但都不是政黨。青年會或許是其中最有可能轉型為政黨者，但這個團體本身有年齡限制，也並非以政治觀點相近而結合，主要是以活動，尤其是「西藏自由運動」為其特色。青年會曾經刻意用心輔導成立一個名為「民主黨」的政黨，但成立之後隨即自行退出該黨，希望能獨立地運作，但顯然「民主黨」並沒有成功地持續發展下去。

流亡藏人社會不認同政黨政治，以致其欠缺生根發芽所需的政治土壤，應是主因之一。桑東仁波切表示，他不認同西方的「多黨民主（multiparty democracy）」，認同的是「超黨派民主（partyless democracy）」。所以，桑東仁波切根本沒有領導籌組政黨的想法，但也不反對有人投入努力<sup>23</sup>。值得注意的是，流亡藏人社會內部存在著反對達賴喇嘛的勢力，但卻是一個宗教團體，而非政黨。桑東仁波切說明，這個名為「雄天宗」的宗教團體反對達賴喇嘛，「在宗教上是信奉者自己的果報，他們雖然人數少，被中共利用，現退出印度，但在尼泊爾根據地，未來數十年人數會越來

<sup>20</sup> 提此問題之時，達瓦才仁拒絕翻譯這個「不敬」的問題，回過頭向訪問人蘇嘉宏以中文說：「這個我不翻！」，達賴喇嘛似乎看出達瓦才仁有不願翻譯的問題，對他以藏文說：「什麼事？你翻譯過來！」，達瓦才仁真情流露、眼泛淚光，勉強予以翻譯。蘇嘉宏訪問達賴喇嘛紀錄（全文）。

<sup>21</sup> 同註10。

<sup>22</sup> 同註10。

<sup>23</sup> 同註10。

越少！這是受到雄天附體，個人沒有自由所以故；佛教相信前世因，今世果，過去五世、六世、七世等多世達賴之短壽，也與此因果相連。」<sup>24</sup>

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化，必須要仰賴一個獨立自主的財政，達賴喇嘛至今仍是西藏流亡政府最大的財政支持者，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如果這種狀況沒有辦法繼續維持下去的話，會不會對西藏流亡政府及其民主化帶來困擾？達賴喇嘛說：

「我們是流亡者，是寄居在印度的土地上，所以不可能有完全達到標準的民主制度，有關經濟狀況，我不是很清楚，政府的財政如果主要依賴外力，則這個政府就很難是一個自主的政府，（達賴喇嘛轉頭問幕僚：我每年給政府多少？但幕僚一時也想不起來！），反正給的不多，政府財政的來源主要是人民的稅款、捐助以及信託管理等，其中從人民中徵收的稅款是很多的，我給的並不多，很有限！」<sup>25</sup>

其中大概有多少比例，達賴喇嘛針對此一追問回答說：

「我不知道有多少比例，有時候有一些建設，如寺院或教育方面，我就會直接捐款，另外我也給印度的一些團體捐款，如菩提迦耶有一個眼睛專科醫院，以前我曾捐過 50 萬，這次去時，我又將人民供養給我的 50 萬元捐給他們，因為人民供養的大多是小面額的紙幣，不是支票，因此，50 萬盧比有一大包，我看到由他們背著走了（笑）！這些我的辦公室應該會有紀錄，此外我還有版稅收入，臺灣人民對我的書買的越多我的收入就越多（大笑）！」<sup>26</sup>

## 陸、北京當局眼中的西藏流亡政府

北京當局的領導人們對達賴喇嘛和他所領導的西藏流亡政府的立場，一直有兩派不同的意見：其中一派主張，只要耐心等到達賴喇嘛在外流亡期間自然去世，這終將使得達賴喇嘛領導的西藏獨立運動自然瓦解；另一派則是認為，達賴喇嘛在世時不能解決的問題，不會因為他的去世而自然消失，從而主張透過重建與達賴喇嘛的關係，並敦促他早日返回中國大陸停止流亡。達賴喇嘛最近數年來在許多不同場合中一再地公開表示，他尋求的是西藏更多的「自治權（高度自治）」，而不是「獨

<sup>24</sup> 同註 10。

<sup>25</sup> 同註 7。

<sup>26</sup> 同註 7。

立」<sup>27</sup>；他也一直嘗試和北京當局進行直接對話。達賴喇嘛走的是不偏於極端的「中間路線」<sup>28</sup>，「獨立」不該是藏族最高的民族價值，藏人的和平保障、人權實現才應是高於一切的理想；「獨立」不一定就能保證換來和平與人權，似乎達賴喇嘛已經深刻體會到這一點，才調整並放棄西藏獨立的決定。

北京當局對達賴喇嘛領導的政治活動和西藏流亡政府，官方媒體長期以來都是以「達賴集團」名之，一直把他定位為「一個決心分裂中國的分離主義者」。儘管達賴喇嘛已經多次重申，他和他領導的西藏流亡政府對西藏獨立或是從中國大陸分離不感興趣，要求的只是「藏人自治」，但以中國大陸全國政協新任委員、佛教協會新任會長一誠法師為例，他在批判法輪功時說：法輪功是邪教，盜用很多佛教術語，打著佛教旗號來迷惑群眾，佛教界對此堅決的抵制。同時，一誠法師並且還說，達賴喇嘛搞「西藏獨立」，我們堅決反對<sup>29</sup>。西藏流亡政府相信一誠法師肯定知道達賴喇嘛已經不追求西藏獨立，而類似這樣的發言在整個中國大陸未來仍然會很常見；畢竟，西藏流亡政府知道，如果北京最高當局沒有明確地改變對達賴喇嘛被視為「分裂主義分子」的定性之前，政治人物恐怕還是會「寧左毋右」，誰也不願意「太過超前」的！

達賴喇嘛一貫主張和平非暴力，所以他曾經以公開聲明反對美國對伊拉克動武。達賴喇嘛要求通過談判來解決西藏問題，而且要求西藏三區的統一，任何把「達賴集團」歸類為恐怖組織的企圖，應該不會成功。達賴喇嘛回西藏後將不會擔任任何的政治職務，而是專心於宗教事務；他可能會去五臺山，但有消息傳說他會「另建行宮」，西藏流亡政府認為那當然是編造的。

西藏流亡政府於 1979 年開始和北京當局進行斷斷續續的對話，達賴喇嘛曾在 1979 年到 1985 年之間六度派團前往北京，但北京方面在 1993 年態度轉趨強硬，正式談判因此中斷，但仍維持了一部分非正式的接觸。2002 年 9 月、2003 年 6 月，北京當局和西藏流亡政府接連兩次恢復中斷了的正式對話，達賴喇嘛並派出代表進

<sup>27</sup>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在接受美國之音記者專訪的時候表示，達蘭沙拉跟北京在西藏的地位問題上「沒有根本分歧」。他說，「北京的立場是：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必須保留在中國的版圖內。對此，我們表示贊同。」資料來源：<http://observechina.net/info/da.asp?ID=17579&ad=7/11/2002>。

<sup>28</sup> 對於「中間道路」的詮釋，可以參考王力雄，「逐層遞選制與民主制：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法比較」，多維周刊，總第 32 期，2001 年 1 月 5 日，資料來源：<http://www.future-china.org.tw/fcn/pr/pr20010105.htm>。王力雄認為，「中間路線」由四個因素構成，歸納為一句話就是：「留在中國以民主制實現整個藏區的高度自治。」其中「留在中國」、「整個藏區」和「高度自治」三點可被視為目標部分，「留在中國」是「整個藏區」（也稱「大西藏」，西藏流亡政府所指的西藏國土範圍包括西藏、青海、西康的全部及四川、甘肅、雲南的部分）與「高度自治」的交換；因此，「中間道路」能否實現，「留在中國」應該是前提。

<sup>29</sup> 自由亞洲之聲，2003 年 3 月 12 日報導。

京、訪藏，此舉可謂走出了歷史性的一步，這也表明北京當局的西藏政策在新世紀開始有了從「疏離對立」轉向為「關係重建」的跡象<sup>30</sup>。

關於談判由誰主導一事，傳聞也甚多！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目前並不是達賴喇嘛的談判代表，所以將來即使雙方展開談判，也不會是由嘉樂頓珠主導，但過去嘉樂頓珠在為雙邊穿針引線方面，確實發揮過正面作用。桑東仁波切表示：「達賴的二哥嘉樂頓珠曾任西藏流亡政府內閣首席部長，1979年開始因為鄧小平的『點名』，北京與達賴喇嘛的接觸才會都有他的參與，到1994年他辭職為止，雙方最後一次接觸也因為其他的一些因素斷掉。嘉樂頓珠退休後居住在香港，既沒有接觸西藏流亡政府的工作，1994年以後再也沒有代表過達賴喇嘛！去年（2002年）8月嘉樂頓珠以個人身分前往中國訪問，回去家鄉探訪。但去年（2002年）9月，達賴喇嘛的代表團也去了中國，前後兩者的時間非常密接，雖然因此產生一些聯想、誤會，但對此西藏流亡政府也不想去否認或特別加以解釋！達賴喇嘛與北京當局接觸的管道，就是西藏流亡政府現任駐歐代表格桑堅贊、駐美代表洛珠堅贊兩位，別無他人！未來，任何西藏流亡政府卸任官員前去中國，都不會是達賴喇嘛的代表。嘉樂頓珠有與北京談判的豐富經驗，未來有可能，但目前仍沒有借重他的地方！至於嘉樂頓珠應該不會利用和談來和中國做生意，但中國方面可能會試圖利用他，我們如此懷疑！」<sup>31</sup>

無論雙方關係如何調整，達賴喇嘛在西藏和海外的藏族社會中普遍地擁有崇隆之威望是一個現實，很難想像北京當局能跳過達賴喇嘛，將來不與他進行任何形式的政治對話；而當對話之際，包括西藏流亡政府的現行政治制度在內的所有方案都應在落實民主原則下，實現藏人的願望。有一種意見認為，「最近印度的流亡藏人已經開始大量回流西藏，這使得達賴不得不開始和北京改善關係。」但是，事實如何？最近幾年流亡藏人回去西藏的的確不少，但西藏流亡政府內部普遍都認為，這和達賴喇嘛是否願意和北京展開談判，完全是不相干的。中國大陸其實並不歡迎流

<sup>30</sup> 達賴喇嘛私人辦公室的副秘書長丹增達卡拉指出，達賴喇嘛的特使和隨行的兩名助理，訪問西藏首府拉薩。他表示，達賴喇嘛很高興這支西藏代表團能夠進行這類訪問。資料來源：<http://observechina.net/info/da.asp?ID=18737&ad=9/11/2002>。美國也十分關注這次訪問，態度似乎相當開朗，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包潤石2002年9月9日在華盛頓舉行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應媒體記者的要求對達賴喇嘛特使訪問北京一事發表了評論。他表示：「我們高興地了解到，達賴喇嘛的特使嘉日·洛周堅贊先生9月9日在北京受到了接待，他還將訪問拉薩。布希總統和國務卿同江澤民主席等中國領導人討論過同達賴喇嘛或他的代表進行對話的必要性。我們相信，通過對話，由來以久的分歧可能得到解決，西藏人民將獲得更多的自由，包括宗教自由。」資料來源：美國參考，2002年9月10日，本文網址：<http://observechina.net/info/da.asp?ID=18720&ad=9/10/2002>。

<sup>31</sup> 同註10。



亡藏人回去，他們認為這些回去的原流亡藏人會帶回一些外面的信息，屬於已經「中毒的人」；而西藏流亡政府長期以來的公開態度一直都是鼓勵流亡藏人返回西藏的，比如說從各級學校畢業的學生，如果願意返回西藏，每人可以拿到一萬元盧比的路費。這裡需要說明的是，這些回去的絕大部分都是上個世紀80年代以後逃出來的，當他們在印度完成學業後，很多人選擇回去，還有很多僧人也一樣。另外，藏人從西藏出來印度的人仍然遠遠多於返回西藏的人。這些數據很容易得到，達蘭莎拉的難民接待站即可輕易獲得過去或近期的數字。

其實現在對流亡社會威脅最大的是「出國」，或者說是「移民西方國家」的熱潮。1990年代初期，西藏流亡政府通過合法途徑讓一千戶藏人移民美國，當他們從美國拿這美元回來探親，或他們為留在流亡社會的家人蓋起樓房以後，到西方去淘金的熱潮就一直是流亡社會揮之不去的陰影。比較可見，返回西藏的藏人相對而言，可以說是「寥寥無幾」。從西藏來的人大部分是年齡層較低的青年、兒童以及喇嘛，其中已經成年的人大都被集中送到成人學校，一般估計成人學校畢業的40%的學生回了西藏，成人學校的學生返回西藏的最多，其他的就是喇嘛。1950年代流亡過來印度的人幾乎沒有幾個人回去，但也有不少人回去探親或做買賣，僅此而已。

## 柒、西藏流亡政府眼中的胡錦濤

中共十六大以後，擔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出身的胡錦濤扶正，他對西藏的政策可能更加嚴厲，或是繼續江澤民與西藏流亡政府接觸的做法，深值關注？有一種悲觀的說法認為，「胡錦濤位子還沒坐穩以前，就必須要表現得更加嚴厲？」，但西藏流亡政府內部對胡錦濤會不會更加嚴厲？並沒有明確的評估結論，大多認為：現在似乎還言之過早，各種可能性都有！但是，比較各種可能性，西藏流亡政府內部認為採取更嚴厲政策的可能性不太高；1994年2月23日，胡錦濤在與前來北京訪問的日本新黨廣報委員張海江田會晤時曾表示，北京同意達賴喇嘛回大陸的條件是再度確認「十七條協議」。這是中國大陸領導人首次表明，以「十七條協定」為達賴喇嘛回西藏的條件。如果對照「十七條協議」和達賴喇嘛提出的「史特拉斯堡建議」，就可以輕易發現，「十七條協議」書面規定的內容，對西藏人更加「優惠」。更主要的是，這是胡至今曾經公開提出的唯一的有關解決西藏問題的新建議。

達賴喇嘛怎麼看待胡錦濤？令人好奇！達賴喇嘛受訪時說：

「現在還難說，一般而言，研究中國的學者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胡在西藏待過，認識前世班禪喇嘛，了解西藏，因此認為是積極的看法。另

一種則認為胡平時不表達自己的意見，難於揣測。一般而言，在『集中制』的情況下，個人因素確實會影響整體的發展，但現在的中國大陸正在發生很大的變化，目前而言，獨裁的因素是在日漸減少，集體決定的成分在增加。現在中國大陸的整體都在發生變化中，信息渠道比以往更多，經濟狀況也較以往改善；因此，這種變化是正在進行中的，而且決不可能再倒退。江澤民的講話中也開始不斷講民主，地方選舉也開始在舉行，逐漸地發生變化是肯定的，中央的政策也肯定會變得越來越寬容和開放，思想不開放是不行的，以往的毛澤東時代，僅僅依靠鎮壓就可以維持，但是現在還繼續這樣肯定不行，應該已經意識到需要收攏人心。相應的，民族政策也應該會隨著中國大陸整體思想的相對開放和寬容而稍稍增加一點自由度。總之，中國大陸整體的變化將會影響到中國大陸的民族政策，不管是在西藏或新疆，一味的高壓政策肯定是難以為繼的，不論程度，總是要設法順應一點民意的。」<sup>32</sup>

即使不考慮這些歷史緣由，至少西藏流亡政府認為胡錦濤曾在西藏工作過，終究比其他中國大陸領導人相對地更加了解西藏，江澤民等上臺之前其實對西藏毫無淵源，也沒有解決問題所需足夠的感性認識。若說了解西藏也都是上臺以後，幕僚作業所提供的書面資料、影像圖片等，有無時間消化都是問題。西藏流亡政府內部人士疑慮，這些資料都是通過在西藏的中國大陸官員所蒐集、研析的，可是在中國大陸那些中國大陸籍的駐藏官員由於在第一線直接承受藏人的反抗壓力，通常是最仇視西藏藏人的一個特定群體，最反對通過和談來解決西藏問題，也最強烈主張強硬鎮壓西藏。因此，過去江澤民、李鵬和朱鎔基等通過這個群體獲得的西藏的信息，絕對是負面的多於正面，中國大陸在這種決策資訊氛圍籠罩下，因而一直在西藏實施高壓的政策。

胡錦濤自己來過西藏、了解西藏，因此應該更有利於西藏問題的解決。西藏流亡政府一直認為和談解決西藏問題絕對符合中國大陸的國家利益，也符合西藏的民族利益；西藏流亡政府一般都相信只要中國大陸政府體認到這點，和談解決應該沒有很大的困難，這也是達賴喇嘛一直相信他能夠在有生之年帶領流亡藏人返回西藏的原因。至於說胡錦濤由於剛剛掌權可能會加緊鎮壓，其實沒有必要。因為，在西藏流亡政府看來，北京當局在西藏對藏人的高壓控制已經很嚴厲了，再加碼也沒有多少意思或必要了，而如果他僅僅想要拖過過渡期，只要維持現有的高壓力度即已

<sup>32</sup> 同註 10。

足夠；因此，更加嚴厲的空間並不大，實際上對待西藏問題，中國大陸政府除了嚴厲鎮壓或是和談而外，幾乎沒有其他的出路。鄧小平、江澤民過去為了突破整個僵局，採取的是在高壓的同時投入大量的資金發展經濟，希望西藏藏人老百姓獲益後認同中國大陸，或以「經濟一體化」增加西藏分離的成本。但是，由於西藏幅員遼闊等現實原因，從中獲益的絕大部分依然是在城市的居民，郊區的農村所得不過是邊緣的、間接的、相對微薄的效益，而遠離城市的農村已經沒有從中得到任何的好處，反而會在拉長他們與城市的貧富差距後，效果很可能與中國大陸政府的原始期望顛倒。

所以，中國大陸政府雖然一直在尋求第三種途徑，如「修建鐵路」等也是其中的組成部分（但更主要的還應是軍事國防上的需要），強化中國大陸與西藏的關係。西藏流亡政府認為中國大陸政府做不到長期無限地高壓控制，西藏流亡政府相信中國大陸政府最後還是要回到談判桌上的。因為從一般的角度而言，鐵路的修建會有兩個明顯的效益，那就是帶動沿線經濟的發展和促進人口移民（就藏人而言，這是「殖民」），但是目前興建中的青藏鐵路經過的都是西藏北部荒無人煙的地區，在快到拉薩時才有一些人口比較集中的地區，這方面的效果相信將會非常有限。如果青藏鐵路到達拉薩繼續向西延伸，基於地理位置與人口分布交錯的政治經濟因素，則西藏自治區東部的藏族居民並不能從中獲益。比如從拉薩到昌都的距離應該比從成都到昌都的距離還要遠，而中國大陸西藏自治區目前人口不過 250 萬左右，其中昌都等地就占了相當大的比例；顯然，火車出現在拉薩所帶來的效益主要的是政治的、軍事的，而經濟的不過是其次。總之，除非中國大陸政府有能力將百萬以上的漢人送到西藏各地並使他們願意在當地定居，否則西藏問題的解決就只能通過「藏人自治」來實現。要實現真正的自治，而且還要保證這種自治不會邁向獨立，就必須要和達賴喇嘛以及西藏政府談判解決，這才是雙方在西藏真正較量的中心。

現在，中國大陸政府花了很多的錢把一些漢族幹部送到西藏來貫徹北京中央對西藏地方的統治，而且是三年一批地經常輪換，也就是說剛了解西藏一般的情況就輪調回去，下一批人還是得從頭適應。但是，藏人幹部「生於斯，長於斯」，會永遠留下來，長期的趨勢是漢人留下來的空缺會由藏人補上去，藏人幹部的比例只會越來越多；前述這種情況在平時尚無所謂，一旦中原政局出現動盪，這些西藏幹部就很有可能成為中國大陸政府的噩夢，而結局很可能是中國大陸永遠地失去西藏。西藏流亡政府認為，中國大陸一直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藏人擔任西藏自治區的黨委書記，其實早就是意識到這種可能性了。但是，靠這種「花錢買人到西藏當三年幹部」的方式，把漢人幹部送進西藏本身毫無疑問地表明了中國大陸高層束手無策的窘

境，和針對解決存在問題的「一時性」。因此，中國大陸政府必須想出，但還沒有想出一個萬全之策；西藏流亡政府則相信這項萬全之策就是和談，只是西藏流亡政府還不知道胡錦濤是否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

## 捌、結 論

### ——中印關係緩解牽動西藏流亡政府與北京當局的關係

面對遲遲不能具體開展的雙方談判、接觸，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總理）桑東仁波切一度提出警告，如果北京在 2003 年 6 月底之前，仍未與達賴喇嘛恢復談判，流亡藏人就要恢復全球各地的對中國大陸當局抗議活動。藏人將以「甘地式的非暴力運動」，抗議中國大陸當局的對藏政策。可以肯定的是，這項要求北京當局在一定的期限以前表現出誠意之前，西藏流亡政府也將會以「自制（針對流亡藏人內部的反對和中國大陸接觸的力量）」來表現出最大的善意。而「六月以前」之說主要是為了對西藏方面的善意（比如不組織遊行示威、中國大陸領導人出訪不進行抗議活動等）做出期限，以免流亡藏人的內部壓力過大，其實並不是針對北京當局的<sup>33</sup>。這則報導證實了西藏流亡政府的向北京當局施壓的用意，以及對接觸、談判的急迫感！

長期以來，中原政情變遷影響西藏局勢。「政教結合」的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建立，有其延續歷史、文化的期許，西藏流亡政府對實行「政教結合」民主制度，做到一方面傳承文化與發展民主，另一方面也接受現實與準備妥協。西藏流亡政府的制度發展中的突出議題是達賴喇嘛的轉世傳承問題，這個問題必須放在與北京當局的和談中觀察。北京當局眼中的西藏流亡政府、西藏流亡政府眼中的胡錦濤都將影響雙方互動的走向，這一切過程在中印關係緩解中，西藏流亡政府與北京當局的關係勢必難以不被牽動。

<sup>33</sup> 自由亞洲電臺，2003 年 1 月 22 日報導。當時稍晚，桑東仁波切也在倫敦強調，這不是「最後通牒」，正是說明了這一點。